

鄉村結構及價值觀的轉變—— 發展社會學理論的探討

· 哲 明 蔡 ·

鄉村社會面對內部及外部情境的改變時，必將產生許多結構方面和價值觀念的轉變。本文的目的，在於敘述鄉村結構及價值觀念有何適應過程和衝突過程，並指出在鄉民、鄉村社會及政策方面，如何產生自信，共同追求鄉村生活品質的提升。

在人類所創造的社會世界 (Social World) 中，可分為社會結構和社會價值觀兩部分。社會結構和價值觀，係為追求社會生存而存在的。價值依附結構而得以實現，而結構為實現價值以存在，兩者是不能分割的整體。若將「發展」看做社會結構與社會價值的共變效果，則屬於社會生存的動態過程。

「結構」包括形式 (Form) 和力量 (Force)，「價值」包括法則 (Formula) 和意識 (Feeling)，此四項要素，即形式、力量、法則和意識，形成社會概念 (Conception of Society) 的四個主要成分。

「形式」所要分析的主題即基本社會秩序，在動態之中，其辯證的連續體在「秩序——無秩序」之間 (Order-Disorder)。「力量」所要分析的主題即權力分配，在動態之中，其辯證的連續體在「中心——外圍」之間 (Centre-Periphery)。這兩個連續體，表現出結構變化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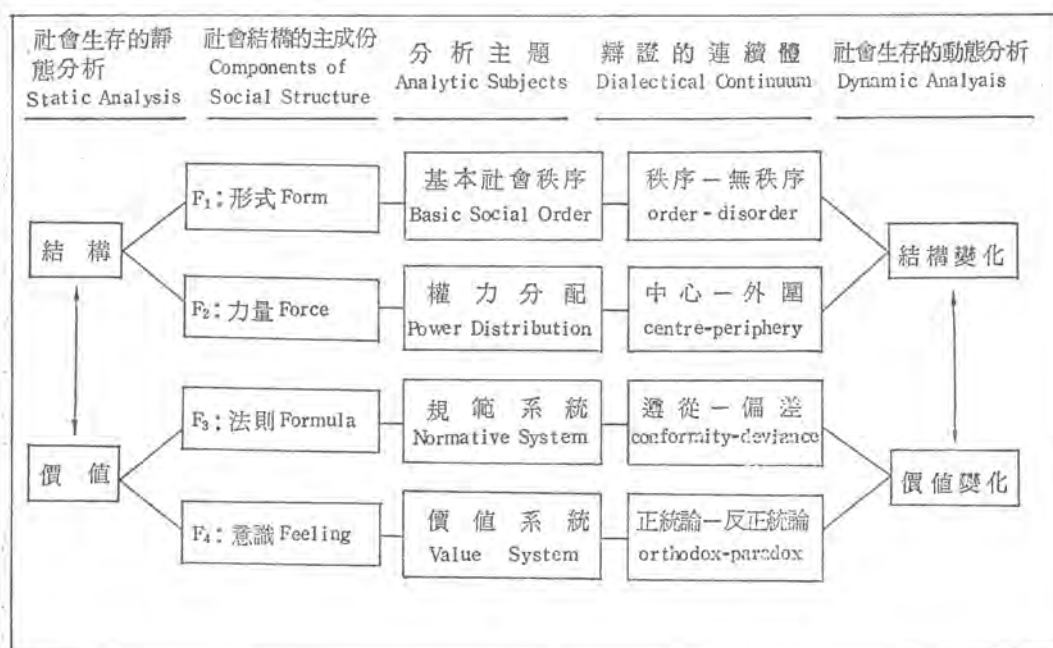
「法則」所要分析主題即規範系統，在動態之中，其辯證的連續體在「遵從——偏差」之間 (Conformity-Deviance)。「意識」所要分析的主題即價值系統，在動態之中，其辯證的連續體在「正統論——反正統論之間 (Orthodox-Paradox)」。這兩個連續體，表現出價值變化的情形。

「發展」是社會持續生存的滿意狀態，也就是為追求良好生存狀態，所顯示的結構變化和價值變化的共變效果。此種社會發展的複合分析法 (the Compound Analysis of Social Development, CASD)，如下表及下圖所示。(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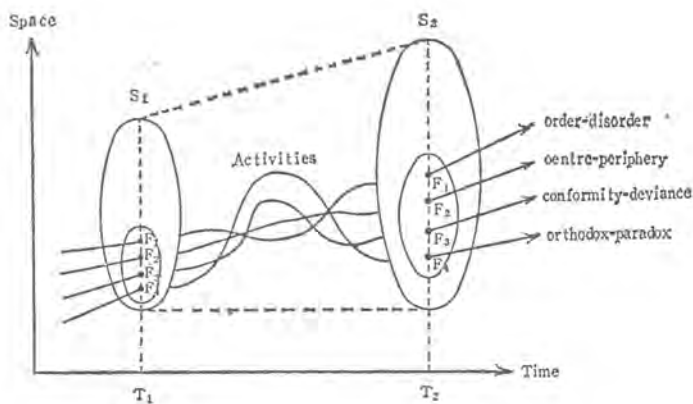
明哲，七十年十二月：七十一—七十三)

(表一) 社會發展複合分析法的範式

A paradigm for the Compound Analysis of Social Development (CASD)



根據社會概念的四個主要成分，即形式、力量、法則和意識。則在鄉村結構變化方面，得知「形式變化」，可從社會秩序多樣性及異質性的結構成長（



T: 時間

S: 空間

Activities: 人的活動

F₁: Form 形式F₂: Force 力量F₃: Formula 法則F₄: Feeling 意識

圖一 「時空連繫座標」簡示圖

Growth) 進行觀察，從而發現分化、整合及適應力升級的發展現象。結構變化亦可從「力量變化」加以觀察，即從權力集中化及分散化的分配 (Distribution) 看，而發現結構依賴的發展現象。因此，在鄉村結構變化的結果，產生兩種發展問題，一是內部結構適應問題，包括舊秩序消失新秩序如何建立、如何持續成長，以及如何提昇吸收變遷的能力等問題；另一是市鄉分配不均問題，包括人口、資源、所得、權力，以及福利或生活機會不均，而需要進行再分配 (Redistribution) 的問題。

若由鄉村價值變化方面看，得知主要在於「法則變化」及「意識變化」，亦即對原有客存軌跡 (規範) 的遵從或偏差，以及對原有主觀選擇 (價值) 的正統或反正統，這兩方面的創新和自立問題，可簡稱為「自信自賴」 (Self-reliance) 的發展原創力問題。

本文第一段屬於鄉村結構適應問題，第二段屬於市鄉分配不均問題。而發展原創力問題，則以鄉村發展中的自信心 (第三段)、鄉村文化的創新力量 (第四段) 及制度移植與規範失調 (第五段)，分述鄉村如何自我依賴，以求生存發展。

壹、成長：鄉村結構適應問題

傳統的鄉村，本身就可構成一個完足的社會。轉變中的鄉村，鄉村開始納入大社會架構，逐漸去適應其新角色。現代工業社會中的鄉村，鄉村成為大社會架構中的一部分，並明確地處於市場系統中的不利地位。

鄉村生活的轉型，當然要看鄉村已轉變到何種階段程度而定。不過，在今日世界上，人口都市化的趨勢成為社會變遷的主流，世界上已有半數以上的人口住在都市社區，使得過去鄉村人口原為多數，現在則為少數，此一轉型過程可稱為「先是多數後為少數」 (First Majority-last Minority)。這種現象，在先進國家如此，在邁向已開發的社會也是如此。

一個社會的結構，受世界性的政經變遷影響下，是否各文化變得更為相似 (Convergent)，或者變得更為歧異 (Divergent)。這個問題，在鄉村發展中

，也是很難回答的。到底都市化和工業化衝擊下，鄉村是否會變得與都市更為相似，或是變得更為相異。為了追求成長，鄉村結構必經提昇其適應力，社會更加分化，而重新予以整合，而其整合後的鄉村新結構，是否必然是都市結構之型態，或者還有其他可能性的發展途徑。

以鄉村傳統領袖，在鄉村結構中的重要性為例，隨著都市化及工業化的長期影響，其結構上的重要性已顯著降低。許多發展計畫，考慮到結構變遷時，通常要培養新領導人才，運用鄉村領袖，來推動計畫。並且認為在運用鄉村領袖的過程中，可以轉變鄉村領袖的智能，同時也轉變了鄉村的社會結構。這就是在行動中，轉變了結構，包括社會形式和力量。尤其，為了鄉村發展的目的，而政府行政能力未及時，運用鄉村領袖的力量，以改變鄉村結構，是一種特別富有吸引力的途徑。

在這個例子裏，鄉村新領導行為，將有別於傳統領導行為，然而領導行為發生在特定時空，雖有一部分，新領導方式受外來文化影響，可能一部分與都市文化，有相似的發展方向。但為適應特殊時空及其活動情境，則必有一部分與都市的領導結構，產生歧異的發展方向。如此看來，好像結構適應的結果，造成普同中有差異，而差異中有普同的現象。簡言之，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有的鄉村結構長期變動而成為都市，也有的鄉村結構雖長期變動，仍不變為都市。

再以鄉村家庭結構轉變為例，小家庭係適應鄉村環境而產生，然而却帶來養老及教養子女問題，即使以主幹家庭 (Stem Family) 做為適應方式，也會產生祖父母對第三代的管教問題。(劉清榕等，六十三年十一月，頁十九—二十) 所以，為適應而做結構轉變，不論用何種方式去適應，總是產生不同程度的問題。

結構適應是一種舊秩序喪失，而新秩序要建立的一種過程。其間的成果，痛苦和損耗等，相互混和。以我國鄉村教育及鄉村建設運動為例，雖然涓滴改變了一些鄉村現況，有了影響。但是，只有鄉村教育及建設運動，也不能完全決定一個鄉村結構的轉變。此一鄉村結構的刺激因素，雖有成果，但也有不少痛苦和損耗。(參閱鄭世興，六十三年七月：二八〇—二八四) 變革逐漸廣泛

被知覺之後，本來想要解決的某些問題，尚未完全解決，通常又累積出許多問題出來。有時，舊秩序瓦解後，使人們產生逐漸升高的期望水準（*Rising Expectations*），而由於新秩序未能快速建立，於是不滿足新的需求，而有結構適應的問題。結構適應的方式有二，一是分工專業化的適應方式，一是增加結構彈性的適應方式。

在一個變遷的大環境中，其中每一種體系不跟著變，但各部分變遷速度並不一致。臺北市郊關渡地區農村及漁村，因受臺北市都市化的衝擊，其生態、經濟、親族、社會、宗教及態度等，六種變數在變遷中，互為影響，沒有任何一種變數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換句話說，就是生態體系，社會體系，文化體系和心理體系，可以互為因果或互相推動變遷。（文崇一等，六十四年六月：二二三—二二三五）

楊懋春與廖正宏（Liao and Yang, 1979:2-21, 26-33）認為：臺灣鄉村近三十年來的社會經濟變遷，其主要的媒介在於土地改革、教育普及、農業推廣、新農業技術的引進、工業發展、交通與傳播發展，以及新文化人的來到等。而鄉村的各種變遷，在於人民心智的改變、家庭生活的改變、社區結構與關係的改變、社區領導的改變、鄉村整體的改變（如土地利用、高利潤作物，更好耕作方法，參與農業推廣），以及從自給自足變成與外界互相依賴。這個研究探討近三十年來臺灣鄉村變遷，發現一項變遷，可做為下一次變遷的起因或種子，並評量變遷計畫如何導致鄉村社區發展。特別在人口、生計、教育、社會參與和家庭五方面，其結構與心理，隨著時間而產生共變效果。

農村問題的來源，有許多說法。如果從發展理論觀察，主要在於三個來源，即對社會變遷適應不良、市鄉分配不均，以及無法從依賴中自立。

內部結構適應問題，解決的關鍵是如何建立動態的鄉村產業（尤其是動態的農業），以及如何建設「創新社區」。市鄉分配不均問題，解決的原則是透過人口、財富、收入、資源、福利等的再分配，例如地方財政及地方建設措施，應有均衡發展的觀念。至於無法從依賴中自立的問題，則必須在鄉民自信心、鄉村文化創新、鄉村價值規範的重建，以期培養「動態產業、創新鄉民」，而參與公共事務，贊助地方公益事業的發展。

貳、分配：鄉分配不均問題

發展是有順序，前後連貫的連續性改變，是適應外來刺激的一種內在改變過程。發展是性質上或結構上的變化，成長則為發展的結果。因此，發展的意義，包括變遷成長。Lauer (1978:51) 認為社會變遷指社會互動模式或文化方面的改變，如規範、價值與技術方面的改變。這種改變而被稱為有利於社會目標者，稱為社會發展。

從社會發展的實務策略運作上說，社會發展的意義也因世界人類的變遷而涵義上有所不同。英國 University of Sussex,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Dudley Seers 於一九六九年發表「The Meaning of Development」，認為一國的發展水準，可從貧窮失業、財富不均的程度來認定。Seers (一九七〇) 又寫一篇「The New Meaning of Development」，則認為發展有新的意義，就是如何對某些強權的文化依賴（*Cultural Dependence*），並且採用一種選定的途徑去面對外來的各種影響。

一九六〇年代，各國為解決社會問題，如貧窮、失業、不公平，希望獲得國際上被尊敬地位，一躍為現代國家，所以，那些貧窮國家很需要「發展」。當時相信發展可用 GNP 來測量。事實上，把經濟成長就當作發展。而通常把分配的問題暫時便在一邊。在發展策略上，有一句話：「在討論如何切蛋糕來吃之前，我們必須先要烘製一個更大的蛋糕。」（*We Must Bake A Bigger Cake Before Discussing How to Cut It up.*）這種看法，強調不公平是必需的，沒有不公平，則無法增加儲蓄，也無法提供投資生產的誘因。並且，如果經濟成長夠快的話，自動會產生再分配的效果。事實上，再分配從來不能自動發生。

一九六〇年代，這種說法已失去信用。已開發國家發現，成長必須付出破壞生態環境的代價。而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也却發現：成長會對某些人或團體較為有利。

「發展」的字眼，一直帶有許多善意和政治意義，除非把社會中的不公平

，失業和貧困除掉，否則一個國家就不可能安和樂利。

從前面所述，發展的意義除了成長（Growth）之外，還要有再分配（Redistribution）的意義。發展計畫必須考慮其社會後果，並且發展工作必須到達偏遠的鄉村地區。發展計畫所要滿足的人民「基本需要」（“Basic Needs”），不是狹義的物質方面，也要包括非物質的需要。此種跟隨著成長而做的再分配策略，其方法並不能真正改變分配狀態。因此，急進派的（Radical）看法指出分配問題，主要在於政治利益上，而不是其他技術性的力量上，所以主張革命（Revolution）。認為文化的力量，可影響人對物質需要的知覺，特別對秀才分子（Elites）的決策或政策有很大影響。同時，一般人的消費及生產模式，與文化力量有密切關係，所以認為培養出在政治和經濟上能獨立自主的公民，不只是社會發展的內在目的，也是促進社會發展的條件。

一九七〇年代，由於「石油危機」的影響，使世人感覺到想維持快速的經濟成長不容易，經濟成長必須考慮地球上自然資源的有限性。以成長來做為發展的意義的說法，又受到批評，然而只對發展的意義新加上一個要素，那就是：自信自賴（Self-reliance）。至此，發展的意義包含了成長、分配和自賴三者。

如何用自我依賴，來衡量發展？在發展策略上，看是否必需品可儘量減少依賴進口，特別是糧食、石油、資本、設備及專家。包括改變消費結構及增加生產能力。自我依賴，也包括加強國家對多國公司交涉的能力，提高國防武器的自製能力等。還有在文化政策上，減少對強權的文化依賴，在學校使用國語、增加本國授予學位比例、增加電視節目的自製率等。

所謂自賴，就是跟隨著再分配與成長而來的更大的獨立性（Greater Independence with Redistribution and Growth）。此種發展計畫所採用的發展途徑，並不強調成長率或分配模式，主要的目標是：

1. 主要經濟部門的所有權和產量。
 2. 消費模式（即與外國交換物資）之經濟化，如石油之經濟化。
 3. 增加國家的研究（Research）和交涉（Negotiation）機構的能力。
 4. 文化目標以對國家的關心（the Country Concerned）為基礎。
- 增強文化獨立，不只影響經濟方面，同時會使政治領袖想在未來減少依

賴，並且可減弱國內的反對勢力。

「發展」不只與國民所得及其分配有關，更有關一社會能否自我依賴。意即對外的交涉能力、外來的新技術及外來的文化衝擊，能否與它相抗衡，而保有依賴自主力量，去繼續生存，達到社會目標的過程。

這個發展意義的改變，並不只是語意上的，它改變了所有人類對世界的知覺。發展這個名詞有文化失調和世代差距的問題，從文化上的物質精神層面去看或者從上一代和下一代去看，發展的意義總是反映著人類世界不斷變化的事實。例如，上一代可能認為人道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有害發展，是發展的障礙；但是，就發展必須以自賴及重要意義而言，顯然人道主義和民族主義，一變而為發展的基元素。簡言之，發展的操作意義，包括注重城市的經濟轉型，和機會均等的社會轉型，加上了再肯定認同國家和文化傳統的文化轉型。希望由自己的努力，以驅散二等國民與外來控制，以達真正自主的發展。

技術先進國和落後國，各別却在急速轉變之中，這些國家又整合為一種變動中的「世界體系」（A Changing “World-system”）表面的一部分。因此，社會發展不是進到某一靜態的目標，而是如 Wallerstein 所說：社會發展是在國家跨越國際行動者之間的一種辯證的交換。（A Dialectic Exchange between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Actors）Ilich 建議至少放棄過去先進國已有的發展模式。因為，先進國的生活品質是可疑的，他們永久不公平，並逐漸疏離感，使人覺醒要去追尋一種與它們不同的途徑。Ilich 提出一種非摹仿的發展過程（A Process of Nonimitative Development），要對自己的社會發展提出新興而創新的路線。依照目標引導過程，並依照結構上的強制（Structural Constraints）來影響它，當代的發展，必須超越那種僅以工業國經驗為導向的方式。所以，有關社會發展的種種探索，是為了解引發繼起的討論，而不能指望有什麼確定的答案。（Portes, 1976:55-85）

就市鄉分配不均問題而言，市鄉平等互賴關係，發展成為垂直階級依賴關係，相當不利於鄉村發展。本段先敘述結構依賴的形成，然後以下有三段談自信心、文化創新及規範重建，做為改造結構依賴的基本動力因素。

垂直階級依賴關係，其形成係歷史性結構的問題，使鄉村處於低階級；即

都市發展附庸的地位。此種階級關係的形成過程，主要是都市將其有利身分結晶化(Crystallization)，而造成順流現象，發展到上層結構去。而鄉村集結了不利身分的結晶化，產生逆流現象，發展受到限制，而落入下層結構(蔡明哲，戰時社會心理，六十八年四月：一六七)。結晶化即將有利的或不利的入口、財富、資源、技術、所得、權力、福利及生活機會，各自集結起來，互為因果。有利的身分與其他有利身分結晶在一起，更產生自我加強作用(Self-reinforcement)，以在分配上佔有更大優勢支配地位。不利的身分與其他不利身分結晶在一起，更加強其附庸在位。處於垂直階級依賴關係者，其發展即受到支配者所限制。都市在發展史上，集結各種有利條件，而這些條件對其再次的發展，有加速獲取有利條件的可能性。鄉村一旦對都市形成不利的發展條件，若其發展又仰賴都市時，則鄉村發展，即受制於許多不利條件的集結，終於只能支援都市發展者多，而鄉村本身的發展，能受益於都市者甚少，這就是不公平交易關係，所造成的分配不均的問題。

垂直階級依賴關係，如都會衛星關係或都市與鄉村腹地關係，做為衛星地區或腹地者，無法與都會或都市中心享受同等的發展成果。要打破依賴關係或附庸關係，而自立發展起來，通常有兩種方式。一是進行市鄉再分配，區域上均衡發展，這是對外爭取自立的方式。一是尋求鄉村本身的新促動因素，即鄉村資源的開發，這是內部潛力發揮的方式。所以，理論上一種是上下垂直差距的縮小，而另一種是平面空間資源的增值。

現代都市成長，是一面倒的發展方式，其人口集中化後，為增加其都市成長的利益，即擴大都市規模，帶動市郊化發展，並對鄰近鄉村產生波及作用。一般成長的理論，均造成市鄉分配不均問題。並且，現代的成長過程，建立在過度剝削或榨取資源的基礎上，過度耗盡資源並污染生態環境，正使這一代的享受，係對大自然負債而獲得的，這筆負債將由後代的子孫償還。

若將都市當做人類的家園(as A Home)，則必須有長住久安的規畫，亦不可有以鄰為壑的作法，更不可有殺雞取卵的作風。若將鄉村當做人類的家園，則必須發揮智慧與愛心，使它成為具有創新性的社區。除非人類正當運用其智慧和愛心，來建設自己居住的地方，否則不論是都市發展，還是鄉村發展，

其結果都不能給人什麼好處。正如我們問一個問題：生活享受越來越多，但是這樣的生活您滿意嗎？感覺到快樂嗎？感覺到幸福嗎？這一主觀知覺及感情，才是衡量發展的最後指標，其餘的指標，只能算是中介指標而已。所以，發展是一項品質的問題。掠奪式的成長，與匱乏式的滿足，都不能稱為發展。同樣是成長，到底人口爆炸可怕，還是慾望爆炸可怕。人口爆炸增加生態壓力，而慾望爆炸則破壞生態平衡。雖然兩者都是有害的，但事實上證明富國的慾望爆炸，其浪費資源和污染生態，遠比貧國的人口爆炸，來得嚴重。(Adler-Karlsson, 1974: 62-66) 富國必須考慮成長方式，並且降低慾望的可能性，以利於人類未來前途。

在市鄉關係的發展上，都市人也要對慾望爆炸的後果做一反省。因為市鄉分配不均，不只是社會經濟上的涵義，也有人文生態上的涵義。都市裏的決策者，不知不覺地促進自己所居住地方的福祉，而忽視鄉村居民的福祉。如果市鄉發展太不平衡的話，短期內雖可看到都市一直在擴大、繁榮，但長期看來，不僅對鄉村不利，也會使都市蒙受不利。新的倫理必須強調：人類與環境合作，並且與其他人數合作，不可為了克服環境而破壞生態，也不可為了快速成長而造成不公平。當然，絕對安全和絕對公平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往這個方向出發，比起盲目的成長，似乎來得更為智慧和更合人性。

叁、鄉村發展中的自信心

發展計畫是一種「人」的問題。在不同地域的人或不同團體的人，儘量能在發展過程中，獲得相近的機會，此所謂「均衡」。在人類生活的各方面需要，如物質、社會及精神需求等，也要「整合」發展。同時，基於對人的尊重及人的潛力發揮，「自我依賴」也是人性化發展計畫的一項要素。因此，Knibb 認為發展計畫，必須走向「均衡整合而自願的發展」(Balance Integrated Self-reliant Development)。(蔡明哲，七十年三月：一六二)事實上，人的確是發展的主要動力，經費不足可發展少用經費的事項，技術不夠，可發展較低技術的事項，人手不夠也只能限制發展的程度。但是，沒有線沒有有的線做法，如果沒有人那就絕對不能做發展的事項了。人性化鄉村發展

計畫，以「自我依賴為基礎。自我依賴就是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與人合作可以使鄉村發展起來。當代的規畫者，多已體認到，任何國家或社會，所擁有最有價值的資源，就是它的「人民是社會經濟進步的目的。根據 Adan Smith 的觀察，一國的繁榮，主要決定於「勞工一般所應用的技術、技巧及判斷力」。成長最快的不產油開發中國家，大多數是擁有受良好教育的人民。較好的健康及較多的教育，同時也可以幫助最貧窮的人擺脫貧窮。」（經建會，六十九年十一月：四，一四四）

關於社會存在與意識之間的關係，Karl Marx 說：「人類的思考是否能假裝為客觀真理，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務問題。人必須證實這個真理，意即證實事實和權力，在實務中，他思考的技節，思考的事實或非事實上面的糾紛，與實務是孤立的兩回事，那純粹是「學者的」問題。」（Bottomore, 1956:67）

Giddens (1976:155,160) 論社會與意識，則有不同的觀點。他認為解釋性社會學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對社會科學思考和方法有貢獻。在解釋的思潮中，社會世界不同於自然世界，係以有意義的、可說明的或有智慧的，依據語言而建立起來的。社會世界不只是用象徵和符號系統構成，而且是一種實際活動的媒介。想瞭解社會世界的存在，要用同樣的技巧來分析描述它。所以，社會行為的描述，依靠行動者如何去建立或重建社會世界的意義架構，以做詮釋性的工作 (Hermeneutic Task)。

在解釋的觀點上，社會學與客體的既存狀態無關，而有關於由主體活動所建立起來，或製造出來的社會存在。人類把自然加上社會性的轉型，經由把它人性化 (Humanising)，而把社會存在轉型，但人類却不能製造自然世界。如果說，在轉變世界中可以創造歷史，因而在歷史中生活，如此做是因為社會的造成或再造，不是一如低等動物那樣，只受「生物程式」限制。所以，人能發展理論，經由技術運用，去影響自然界。然而，却無法像他們在社會世界所做的那樣，去建構自然界的形貌。

談鄉村建設的有形與無形建設的關係，或討論農民性格的轉變，這些為人而存在於人中的社會事物，一方面是唯物的，另一方面在意圖上 (Intent) 則

是唯心的。有些物的變動，自然地合人的意圖，但有些必須社會性的修飾，始合於人的意圖。

例如在辯論鄉村物質建設和精神建設那個重要，這實在是不正確的說法。我們可以這樣說，有那一件物質建設，不需經由人的意圖去做，又有那些精神建設，不需物質架構來支持。大體上說，物質與精神兩部分，在人的世界裏，原本不是可以做文化的截然二分 (Bifurcation of Culture)。當然，在鄉村建設方法上，先取兩方面之一方，或兩方面同時去做都可以。只要注意如何在進行物質建設時，能附加精神建設的涵義即可，如社區基礎工程建設進行中，有否因而提升民衆合作及參與精神。而在推動精神建設時，如法治精神的提倡，必須能在實際行為和社區公共設施的維護上有所表現。簡言之，心的所向物需隨之，物之建構以符心意。這是人類有別於其他生物的所在，也是談論鄉村建設的先決認識。

鄉村發展中，鄉民的心理建設，是為鄉村發展的手段，又是鄉村發展的目的。例如社區發展既以民衆態度的合理化、公益的參與感，以及合作的團結力等，做為順利推動之起動力，而社區發展的成效，其最主要的指標，仍為能否讓民衆自助助人，以解決公共問題。此為心理促動物質發展，而物質支持心理發展的明證。

社會學者、人類學者及心理學者，曾對農民性格做了許多假設，例如認為農民性格中，常表現出缺乏自我認識、缺乏改進動機、缺乏信心、偏狹的人際關係、缺乏合作觀念、有依賴心、狹隘的世界觀、利益有限觀，以及現世報觀（即注重短期利益）等。若將這些假設，加以檢驗，可能在某一時空下的農民性格，存在著上列的某些性格特徵。根據一項調查，台灣地區某地的農民性格，除了缺乏自我認識和改進動機兩項，必須修正看法外，其餘七項性格上的特徵，不但真正存在，而且對於鄉村及農業發展，會產生阻礙作用。（江若珉，農推青年，七十一年六月：二三）

鄉村發展過程中，應積極運用鄉村發展的心理動力因素，始能促進鄉村地區的發展潛力（蔡明哲，六十八年六月：五六——五九）。現階段鄉村發展，由於許多計畫是由上而下演繹而得的，很少是由下而上歸納民衆需要，去從事

發展的。所以，長期以來產生鄉民的依賴心並缺乏自信心。比如說，民衆普遍以爲地方建設是政府該做的事，他們沒有什麼責任，也不必參與。事實上，地方建設雖有許多要依賴政府做，但全依賴政府做，永遠不會做得周全，如非民衆自己也一起合作努力，就不會有比今天更爲發展的好生活。

這裏要標明的問題是：長期以來的地方建設事業，並未培養出民衆關切公益的心理，也沒有養成民衆對地方建設的責任心。如其公益心和責任心稍嫌不夠，我們應期望，未來的各種地方建設事業，除了做些具體可見的公共設施之外，可否多考慮如何提昇民衆的心理動力，即運用地方建設，來培育鄉民的自信心，開拓精神，以及建設鄉土的意識。

基層鄉村民衆，必須鼓勵鄉村青少年，去堅守職業倫理，訓練職業技能，並允許青少年，以其自信心自由開拓職業領域，使鄉村的社會風氣，家庭教養或學校教育，都具備正確的鼓勵方向。必須使青少年配合鄉村發展，而有一種健全的服務人生觀，並能以其開拓精神，重建鄉村文化水準。使未來的鄉民，有信心去建設一個有特色、講合作、有希望和能創新的鄉村社會。

肆、鄉村文化的創新力量

鄉村文化與都市文化是否實際存在，這是一個很難說明的問題，在美國的研究顯示，居住和職業上的差異，與鄉村文化有關，使鄉村文化與都市文化產生差異性。但是，宗教信仰、收入狀況和年齡等因素，則更能區分出鄉村文化的保守性。(Miller and Luloff, 1981:608)

從一種保守性的鄉村文化，如何可能產生創新的力量。這是值得探討的課題，此一課題在鄉村發展而言，非常有意義。以下就從幾方面，試論鄉村文化的創造力問題。

一、建立一個新人文主義，以指引鄉村文化的方向，以免重蹈都市文化的缺失。都市文明的主要成果，表現在科技制度(Technocracy)和科層制度(Bureaucracy)兩種方式上。而兩者對人類生活，有著既深又廣的影響。好處暫時不談，科技制度的缺點，是過分強調人定勝天的觀念，破壞自然生態，容易導致「自然反擊」的後果，並且使物欲橫流，以爲人可以駕馭一切。科層制

的缺點，是過分理性的結果，人的組織生活喪失感情的憑依，將人的意義工具化，導致非私人性及反人性化的後果。這兩種制度，前者是人控制自然界以追求效率的工具，後者是人控制其他人以追求效率的工具。科技制度產生物化，科層制產生非人性化，都是值得探討的地方。

人文主義原是掙脫宗教及封建約束，以發現人及人生意義的一種思想。而使得現代科學知識和理性組織，得以興起。但是，發展的結果却成爲人霸主義。因此，要建立一個新人文主義，其做法是：人如何以其動機和智力，去創造文化；如何使人的社會關係具有建設性；社會制度如何汰舊更新，幫助人盡其性；如何在經濟行爲中，遵守經濟倫理，使合乎公道；如何引導大眾參與歷史創造，以表彰人類在萬物演進中的力量與成績。(楊懋春，六十七年一月；二四，二八——二九)

二、鄉村建設與文化再生。梁漱溟解決中國文化問題的办法，是經由鄉村文化再生去努力。鄉村建設規畫的藍圖，包括經濟、政治及社會改造，而其目的要發展出一種前所未見的新型式的文明，此種文明是以理性爲基礎的正常人類文明。(Guy S. Alitto, "The Last Confucian", 1979:192)

「民族自救運動之對固有文化起反感是一定的，沒有法子不這樣。開頭大概非起反感不可，慢慢的再折回來。」比較心氣從容一點的人，才可看到真正的覺悟。所以，梁漱溟認爲都市文化生活，老是匆匆忙忙，不會發生深刻的覺悟。因爲都市生活，對文化病完全不了解，真正的力量要鄉村才能醞釀得出來，發生很大力量使都市也知道。(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鄉村建設旬刊，二十四年二月：朝話)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可能因時代不同，似乎較忽略鄉村與外界的互動關係。例如，中國工業化必須建立在爲消費而生產的原則上，大體上以國內消費爲導向的工業化。從農業引發工業，從鄉村入手做爲中國社會建設根本，多是一單向理論關係。有一點是很值得思索的：「想促進農業，一定要放在整個鄉村建設裏面來作，單從農業上講農業是錯誤的。愈是目的所在愈不可在那裏用力，正面直接用力，都是最笨最沒力量的」。應從四面八方往一個地方用力，却不能從一個地方往四面八方去用力。這是千方百計做一事，不要一心作千

百件事。所以，從各方面用力集中在鄉村，鄉村發展，中國社會就會自然進步。至於，都市仍是社會中心，即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但鄉村應為社會重心，工業化鄉村是中國社會發展重心之所在。（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唐山版，330-332，404-405）在鄉村建設運動方面，他認為有兩大難處，一是高談社會改造而依附政權，一是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

發展經常是政治性的，並且與價值觀念有關，鄉村發展研究，必須明白這些特徵。（Hobbs, 1980: 7, 21-22）鄉村文化工作，是一種教育性工作。而教育是沒有所謂中立的教育，既為了教化也為了自由。教育能發生反制的作用（De-conditioning），乃因為人類基本上是一種被制約的動物。所以，他必須經由教育，使他有能力知曉：到底是什麼在制約著他，有能力對某種行動和行為作反應，並且對自己的知覺有所瞭解。（Freire, 1977: 9-16）

「知覺的瞭解」（Perception of Perception）的關鍵，在於將隱藏著的和神秘化的事實恢復起來，這關鍵即是懷疑（Problematization）。懷疑意即問題和找問題，因而是一種挑戰的態度，這是超越命定論的實踐功夫。如果大眾保持沈默，沒有能力懷疑，只會被動接受革命教育家（Revolutionary Education）的意見。如此，則文化不能再生。

受教育者有能力與流行的意識型態對話，所以，教育可看成為自由而做的文化行動（Education as Cultural Action for Freedom）。Freire 認為對人類而言，教育是為自由而做的文化行動，因而是一種理解而非記憶的行動。在既有的文化中，懷疑和創造是教育所要達到的目的。這種文化創造力的教育活動，可以打破沈默文化和疏離文化。

再從客觀的文化事實看，鄉村發展有關的文化事實，也值得探討，以下從文化傳播、宗教創新和青年訓練等討論之。

一、文化傳播：都市化使鄉村社會規範和價值觀，產生不少變遷，但文化差異仍繼續存在。Fischer 將此現象稱為文化擴散的階梯模式，也就是說都市文化對都市化程度不同的地區，會有不同的文化變遷率。（周碧娥，七十二年，一一〇——一一一）這一假說，值得檢驗。

地方機構如農會、公家機關、學校、社團及企業，如能擬訂文化政策及計

畫，透過業務及人際關係，來改造鄉村文化，必能發揮很大的創新力量。一方面可以把機構整合到鄉村新文化中，一方面鄉民可整合到新鄉村社會中。（參閱：林梓聯，六十六年十二月：一一八；劉清榕等，六十六年十二月：一六七——一六八；蕭崑杉，六十六年十二月：三二四——三二五）

二、宗教創新：農民的社會生活，以社會參與、娛樂型態、消費型態和宗教活動為最重要。農民在都市化影響下，雖有改變，但變化速度遲緩。對於傳統價值相當依戀，而對超自然信仰十分虔誠（林松齡，七十年八月：三八——四二）。就宗教活動而言，如何引導民衆將花費在拜拜的過多財力、物力和人力，轉移到地方建設與福利事業上，應當是一條鄉村文化創新的途徑。在地方上，地方領袖以宗教活動，做為加強或鞏固其社會地位的手段，在人情上和實際利益上，很少能提倡節約的。如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瞭解民衆的想法。

民衆在各項公共事務上，只認為「神明事」才是大家的事，其他如教育事業等，不屬於大家的事的範疇，那可能是政府的事或是少數熱心的有錢人的事。子弟唸小學，學校有危險教室，家長很少拿出錢來協助整建。而神廟如要整建，從心底、口中和行動上，沒有人能說不是他的事。

民間信仰深植人心，原是無可非議。例如，大甲媽祖每年同北港，來回徒步一百五十公里，花費八天時間，徒步進香信徒有數萬人之多，其誠意令人感動，由此窺知宗教力量的存在。地方領袖在此活動中，如置身事外或反對此項活動，必會喪失領導地位。既存事實若無法反對，則必須「從四面八方用力」（梁漱溟語），也引導鄉民參與其他公益事業。這樣，可以把民衆引導向人性化的鄉村文化創新上面，使其不在神化和物化的侷限中兜圈子。政府在宗教輔導的角色，必須降低政治意味，而強調文化創新的導向，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從四面八方用力。

三、青年訓練：青年是社會再生作用的結果，也是一種社會轉型作用的媒介（Youth as the Outcome of Societal Reproduction and as An Agen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青年是社會化的產物，在社會架構內，以及依照其文化內容加以瞭解，這就是從社會再生作用，來瞭解青年。青年又被視為轉

型作用來瞭解，因為青年在社會價值觀念的社會化中，具有某種選擇的自由；一方面由於意識型態的多元化而來，另一方面係文化與教育矛盾以及社會衝突而來。(Rosenmayr, 1979:17)

在鄉村青年的職業技術訓練的研究中，常認為鄉村青年缺乏一技之長，不論做為未來農民或從事非農業行業，都會產生職業適應問題。然而，從職業倫理看，今日企業主和從業人員，都普遍缺乏敬業樂羣的精神，這或許對於未來鄉村文化和都市文化，均有不利影響(楊懋春，六十五年十月：一三——一四)。簡言之，青年是社會教育出來的，又成為未來社會的主力。如何慎始給予完足的教育訓練，也是鄉村文化創新力量的主要來源。

伍、鄉村發展與規範失調

規範意指某一時空的某一社會位置的人，在羣體中被期待的行為表現方式。社會變遷或鄉村發展，有些舊規範逐漸消失，或抗拒舊改變；有些新興規範，則被接受或被排拒。不過，變動社會中，新舊規範的混雜與消長，對人類行為有很大影響。

鄉村發展過程中，如有新的農業技術和家庭設備出現，而無新規範、價值或觀念與之配合，則產生結構與心理的失調。必須使結構與心理相整合，才形成一項新興協調的文化項目，而被納入鄉民生活的核心理去。結構與心理的配合有兩種配合方式，一是實用性的配合，一是欣賞性的配合。

鄉村農業商品化，却少收集市場行情，建立新生產組織及運銷系統。子女負擔重，而沒有節育觀念，仍然重男輕女，子女期望數偏高。(林松齡，七十年八月：三八——四二)心態上處於傳統價值規範，而現實生活條件却已變化，最容易產生規範失調。

這類現象，在鄉村變化中，幾乎俯拾皆是。如有現代化的活動中心，而沒有新的領導活動的規範；有新修的馬路，而不遵守交通規則；有新建公共設施，而沒有維護習慣。另外，乘坐現代化汽車，而在危險道路上灑冥紙的迷信行為，也是文化湊置(Cultural Juxtaposition)後，產生的規範失調現象。

來自農場農家背景的人，比來自都市家庭背景者，受現代性的影響較少。

農場農家背景，對現代性有明顯效應。所謂個人現代性(Individual Modernity)，包括五項價值取向與：1. 大家庭連繫性小。2. 關心國家或國際事務。3. 接受變遷的能力強。4. 平等主義。5. 講求效率。(Grasmick and Grasmick, 1978:367-369)

鄉村居民排難解紛的步驟，先採用非正式規範系統，如地方長老及村長等，無法擺平才用正式規範系統，如警局和法院的力量來解決(Thelin, ed., 1977:51)。由於不熟悉正式規範系統的運用，常無法保護應有的權益。

另外，為貫徹農業政策，應將獎勵農業有關的法令、規定，使農民瞭解而能運用這些法令規範，一方面有助政策推廣，一方面可造福農友。(板橋市農會，七十一年七月)

研究鄉民物質概念的變遷及態度改變，可瞭解鄉民價值規範的改變情形。在物質概念方面，如對財產、科學、工業化、企業化、利潤、家庭計畫等觀念的轉變，即能深入瞭解鄉民價值規範的轉變。(Yang, Martin M. C.,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1969.) 同時，這些概念之間的結構關係，也是觀察出規範衝突的情形。

社會規範係經由大眾傳播媒介接觸、團體接觸和個人接觸等途徑，被社會化而獲得的。從個人社會化觀點看，都市居民不像鄉村居民，較受到親戚和鄰居的影響，都市居民在親戚、鄰居和朋友三者中，較受朋友的影響。(Tsai and Sigelman, 1982:582)

關於社會變遷對規範權威性的影響，以及由地域性價值(Local Values)所表現出或支持的規範，也很值得分析。

一、變動社會中規範的權威性問題：鄉村社會主要的變遷來源，是文化、技術、科學及意識型態的影響。這些影響，有一部分來自西方工業國，一部分則來自本國的秀異分子。(Potter, et al., ed., 1967:38)傳統的農民(Peasant)，不以經濟意義來經營農工企業，他們是以一家戶的消費為導向，而不是一種商業導向，因此其關心的事物及組織方式和行為規範，自然與現代農民或農業企業家不同。(Wolf, 1966:2)

Max Weber 把支配力與權威視為同義，認為支配是一種內心互為主觀的關係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而 Karl Marx 把支配看做社會關係結構上的既存事實。(Hunt, 1978:119) 若從 Weber 的觀點看，權威是內心對支配力的知、情、意，而足以引發實際行動的力量。

鄉村法治觀念的普及，基本的問題在於民眾日常生活中，是否尊重或遵從合法的權威。正式法律規範的權威，只有在遵從的動機和行為上生效，才有意義。因此，要養成不以身試法和不輕蔑法律的觀念，不可行的法律規範應廢止以免生弊，並且執行上不可因特權而創特例等，始有崇法務實的鄉村新文化出現。

二、社會價值觀念的影響：過去鄉村社會一直被看做有一種共識價值觀，此一共識獨特地存在於鄉村生活中。現代鄉村環境，因工業化及組織變革，對價值觀頗有影響。(England, et al, 1979:119) 價值觀與一個人的成就，尤其青年到成年期間，特別有影響力。(Howell, et al, 1981:465) 價值觀也跟一個人對事物所持的態度有關係，例如，務農者對於政府在飼料及殺蟲劑、水土保持及土地利用，以及安全與農業生產等方面，是否規定太多。以測量農民對政府干涉農業所持的態度。(Hoiberg and Bultena, 1981:389)

中國古代鄉黨實踐道德，可說是農村生活的價值規範。鄉黨在古代是平民生活的整個範圍，其實踐道德主要有三：1. 尚齒思想：是孝悌的擴充，因年齡大而獲得權威。在鄉有齒的權威，在朝有爵的權威（即身分權威）。鄉置於國與家的中間地位，鄉是實行相同習俗的地域範圍，所謂「鄉有俗，國有法」。

2. 親和思想：人倫秩序有待親和方能實現，睦鄰觀念為鄉黨親和的典型。「宅可買，鄰不可得也」，而有擇鄰觀念和樂羣觀念，互通心曲，互助互愛。

3. 鄉約：是教化組織。宋呂大鈞的呂氏鄉約，以建立鄉人自己行為的準則，並依相親相勸的方法，圖其實現。鄉約，即以修養及互助為目的之社團。呂氏鄉約，有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等四項綱領。（參閱：佚名，中國農村社會道德研究，蔡漢賢，六十七年六月：七九——一二二）

家庭生活的調適，只要家人互相體恤，有事分工，共同商量，亦即如能善於安排，就可調適。社會規範的調適，也一樣要有所安排，才能調適。（高淑貴等，七十一年十月：一八四——一八五）

鄉村投票率高，是因派系衝突的結果（黃大洲，六十二年六月：二二二）。這表示大社會的概括性規範，存在於理想文化(Utopia Culture)，而小社會的特別規範，則另有其實存文化(Real Culture)。兩者亦有協調或衝突的可能性。

鄉村社區生活的價值觀轉變，可以從三個變化趨勢，加以觀察：1. 鄉民用因果關係解釋人類行為。2. 重視生活享受。3. 外界導向代替內在導向。（徐震，六十八年四月：一四四——一四五）

高度成長是一個不斷干擾的過程，舊有制度與新制度相干擾，以及經濟羣體之間互相干擾。（經建會，七十年四月：二二三）這種干擾常隨著新技術的吸收與交流，而轉變原有的工作環境及生活規範。在變動社會中，如何去適應和創造新興的規範，總是一項值得探討的問題。

重要參考書目

壹、中文部分

文崇一、許嘉明、瞿海源、黃順二，

西河的社會變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六十四年六月。

行政院經建會經濟研究處編印，

一九八〇年代國際經濟問題與展覽，當代經濟叢書之四十八，六十九年十一月。

台灣經濟成長及結構移轉（上下冊）當代經濟叢書之五十，七十年四月

江玉龍 台灣鄉村人民外移之研究及其政策：以台北、台中兩地區為例

中國社會學刊 六十五年五月 頁九十九——一二三

李登輝 台灣農業發展的經濟分析 聯經 六十九年八月

吳聰賢 台灣農業發展策略 台大農業推廣學報 第六期 七十一年十月

頁二三——二六五

林志鴻 當前農業改革的分析——一個知識論的反省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七十年元月

林松齡 台灣南部一個農村的研——港墘村的社會學分析 東海大學出版

版社 七十年八月

林梓聯 劉清榕及蕭崑杉三篇論文 農業推廣文集 六十六年十二月

板橋市農會 您想知道的農業法令集 七十一年七月

周碧娥 美國鄉村地區的都市化 社會經濟與規範的變遷 一九五〇—七

〇比較社會學 中美社會之比較研討會論文集 中研院美國文化研究所

七十年元月九十一—一六

徐震 社區與社區發展 正中 六十九年十月

席汝楨 一個農村社區的領導型態 中國社會學刊 第二期 六十一年十

二月 頁一—二十二

高淑貴 鄭美蓮 高彩雲 變遷社會中母子關係調適之研究 台大農業推

廣學報 第六期 七十一年十月 頁一四—一九二

黃大洲 雲林縣四湖鄉林厝寮社會經濟調查報告 台大農業推廣學系 六

三年六月

陳其南 陳秋坤編譯 馬若孟 (Rainon H. Myers) 著 台灣農村社會經

濟發展 牧童 六十八年二月

陳昭郎 『吾愛吾村』計畫——一個計畫性的鄉村發展運動 台大農業推

廣學報 第五期抽印本 六十九年十月

楊懋春 「致富有道——建立均富社會的途徑」 天視出版公司 六十五

年十月

——淺說人文區位生態學 中國社會學刊 第四期 六十七年五月 頁一

—十

——近代中國農村社會之演變 巨流 六十九年十二月

蔡宏進 廖正宏 黃俊傑 我國農業建設的回顧與展望 時報文化公司

七十二年三月。

劉清榕 李明圖 現代化與家庭結構變遷 社會建設 二一號抽印本 六

十三年十一月

鄭世興 我國近代鄉村教育思想和運動 正中 六十三年七月

蔡宏進 台灣現代化農村之設計研究 台大農業推廣學系 七十年一月

蔡明哲 鄉村發展中的心理建設 人與社會 七卷二期 六十八年六月

頁五十六—五十九

——都市社會發展原理 鄉土建設研究叢書(1) 自刊本 七十年三月

——台灣社會發展研究的幾個方法論問題——一項社會發展複合分析法的

擬議 東吳政治社會學報 第五期 七十年十二月 頁五十八—七十七

蔡漢賢 社會工作有關資料選註 中國文化學院社會工作學系 六十七年

六月

龍冠海 都市社會學理論與應用 自刊本 六十一年七月

蕭崑杉 農業發展與鄉村貧窮 思與言 二十卷六期 七十二年三月 頁

五九二—六〇六

蕭新煌 春天裏的秋天 對鄉村社會學與農業政策的檢討 聯合月刊 七

十年十二月 頁五十九—六十一

貳、英文部分

Adler-Karlsson, Gunnar, "Harrying and Caring Capacity", Stock-

holm: Royal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1974.

Bottomore, T. B. and Rubel, Maximilien, eds.,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London: Watts and

Co., 1956.

England, et al., "The Impact of a Rural Environment on Values,"

in "Rural Sociology", 44(1), 1979, pp.119-136.

Freire, Paulo, "Cultural Action for Freedom", U. K.: Penguin

Books, Reprinted 1977.

- Giddens, Anthony,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ies", N. Y.: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6.
- Grasmick & Cmasnick, "The Effect of Farm Family Background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s of Urban Residents: A Study of Cultural Lag", in "Rural Sociology", 43(3), 1978, pp.367-385.
- Hettne, Björn,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Third World", Stockholm: Swedish Agency For Research Cooperation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1982.
- Hobbs, Daryl J., "Rural Development: Intentions and Consequences", in "Rural Sociology", 45(1), 1980, pp. 7-25.
- Hoiberg and Bultena, "Attitudes toward Governmental Involvement in Agriculture", in "Rural Sociology", 46(3), 1981, pp. 465-482.
- Howell, etal, "The Ambition-Achievement Complex: Values as Organizing Determinants", in "Rural Sociology", 46(3), 1981, pp. 465-482.
- Hunt, Alan, "The Sociological Movement in Law", Philadelphia: Tempk Univarsity Press, 1978.
- Laner, Robert H,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owa: Wm. C. Brown Company Publishers, 1978.
- Liao, Cheng-hung and Yang, Martin M. C.,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Rural Taiwan, 1950-1978", Taipei: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xtension, NTU, February 1979.
- Long, Norm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Rural Development",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7.
- Miller and Luloff, "Who Is Rural A Typ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Examination of Rurality", in "Rural Sociology", 46 (4), 1981, pp.608-625.
- Mosher, Arthur T., "Thinking About Rural Development", N.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uncil, Inc., 1976.
- Portes, Alejandro, "On the Sociolog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AJS", 82(1), 1976, pp.55-85.
- Potter, Jack M., etal, eds., "Peasant Society: A Reader",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 Rosenmayr, Leopold and Allerbeck, Klaus, "Youth and Society", in ISA, "Current Sociology", Vol. 27, No.2-3,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79.
- Thelin, Mark C., ed., "Two Taiwanese Villages", Taichung: Tunghai University, 1976.
- Tsai, Yung-mei and Lee Sigelman, "Ne-Community Question: A Perspective from National Survey Data-the Case of the USA", i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3, No.4, December 1982, pp.579-588.
- United Nations Dev. Programme, "Rural Development: Issues and Approches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Evaluation Study No. 2, N. Y., June 1979.
- Wolf, Eric R., "Peasants", N. J.: Prentice-Hall, Inc., 1966.
- Yang, Martine, "A Chinese Village", N.Y.: Columbia Univ. Press, 1945.